



国难中的学术与政治： 中国经济学界的争鸣 (1932-1937)

The Academics and Politics in the National Calamity:
Contention among the Chinese Economists, 1932-1937

吴敏超 著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国难中的学术与政治： 中国经济学界的争鸣 (1932—1937)

The Academics and Politics in the National Calamity:
Contention among the Chinese Economists, 1932-1937

吴敏超 著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国难中的学术与政治：中国经济学界的争鸣（1932—1937）/吴敏超著.
—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4.3
ISBN 978-7-5161-4071-0

I. ①国… II. ①吴… III. ①经济史—研究—中国—1932—1937
IV. ①F120.2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4)第 051024 号

出版人 赵剑英
责任编辑 吴丽平
责任校对 王 斐
责任印制 王 超

出 版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社 址 北京鼓楼西大街甲 158 号（邮编 100720）
网 址 <http://www.cssp.cn>
中文域名：中国社科网 010-64070619
发 行 部 010-84083685
门 市 部 010-84029450
经 销 新华书店及其他书店

印 刷 北京君升印刷有限公司
装 订 廊坊市广阳区广增装订厂
版 次 2014 年 3 月第 1 版
印 次 2014 年 3 月第 1 次印刷

开 本 710×1000 1/16
印 张 21.5
插 页 2
字 数 386 千字
定 价 66.00 元

凡购买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图书，如有质量问题请与本社联系调换
电话：010-64009791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国家社科基金后期资助项目

出版说明

后期资助项目是国家社科基金设立的一类重要项目，旨在鼓励广大社科研究者潜心治学，支持基础研究多出优秀成果。它是经过严格评审，从接近完成的科研成果中遴选立项的。为扩大后期资助项目的影响，更好地推动学术发展，促进成果转化，全国哲学社会科学规划办公室按照“统一设计、统一标识、统一版式、形成系列”的总体要求，组织出版国家社科基金后期资助项目成果。

全国哲学社会科学规划办公室

序 言

吴敏超在她的著作《国难中的学术与政治：中国经济学界的争鸣（1932—1937）》一书出版之际，邀我为之作序，作为导师和本书第一读者的我似乎不应推辞。吴敏超在博士研究生毕业后的5年中，潜心研究，多方求教，终于在她的博士论文基础上补充修改成现在的这一著作。在修改期间，她曾就著作中的若干重要问题写成9篇专题论文，发表在《近代史研究》等学术刊物上，有两篇被《中国社会科学文摘》部分转载，显示了对这一课题研究的先期成就。

吴敏超的这一研究，应属中国近代经济思想史的学科领域。其研究的主体对象是20世纪30年代刊行的《中国经济》、《经济学季刊》、《中国经济情报》三个经济刊物及其分别集聚的三个作者群体，即以国民党内的经济学者为主体的汪精卫系经济学派、以留学西方的经济学者为主体的自由经济学派、马克思主义经济学者为主体的左翼经济学派。并与时代背景相结合，透视九一八事变到七七事变间中国经济理论界对强国之路的探讨，重点揭示三大经济学派的政治和学术背景、所持主张的异同，及其思想交锋和学术分派，以及对国民政府经济决策的影响。

1932—1937年间，是中国经济理论界较大发展和较为活跃的时期。这五年，一是通过清末民初出国留学和国内新式教育而成就的新式经济学家已进入成熟之时，使中国的经济学界呈现出规模化、群体化和多元化的状态。二是中国获得政权统一之后兴起新的经济建设高潮之时，经济学界关心国家经济建设的情怀得到激发，对中国经济发展途径的探讨相应进入新的时期，各种主张纷呈不已。三是九一八事变后日本和其他列强经济侵华活动及其所带来的中国经济危机，刺激了中国经济学界，使他们防范和抵制日本及其他列强侵略的意识逐渐增强，四是因第一次国共合作破裂之后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家阵营的出现和初步成长，成为探讨中国经济发展之路的另一种理论源流。与此同时，这五年，既是中国近代经济由自由经济体制向统制经济体制过渡，并形成第二次发展高潮的时期，也是中国近代

2 国难中的学术与政治:中国经济学界的争鸣(1932—1937)

经济面临诸多新问题和新挑战的时期。与此相应,经济理论界发表了众多的对策性言论,他们的政治和学术背景虽各有不同,主张亦各有所持,但却有一个共同时代性特点,即为中国经济的进一步发展和抵御列强经济侵略寻找有效之路。在这样的时代背景之下,这五年中的经济理论界所阐发的经济思想,自有其独特之处和承上启下的地位,是中国近代经济思想发展史中一个重要的阶段。

吴敏超的这一著作,作为一本中国近代经济思想史研究的著作,其值得关注之处,不仅在于它的题材、内容和观点将给读者提供不少新的信息,更在于它的研究路径颇有开拓创新之意,这主要表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首先是将研究对象从个人扩展到群体,又从单一群体扩展到多元群体。中国近代经济思想史研究,长期以来多以单个杰出人物的经济思想为一个单元研究的对象,如郑观应、康有为、梁启超、孙中山、张謇、马寅初等人的经济思想;到1990年前后,社会经济思潮研究开始兴起,如重商主义思潮、实业救国思潮、振兴实业思潮、抵制洋货思潮、提倡国货思潮、工业化思潮、统制经济思想等;2000年前后,有一些学者开始关注群体性经济思想的研究,主要是对某一个派别或某一个刊物的经济言论进行研究,如派别方面的洋务派、早期改良派、维新派、革命派等的经济思想,刊物方面的《大公报》、《新经济》半月刊等的经济言论。现在,吴敏超的著作,更进一步地将三个经济刊物及其作者群体作为一个单元进行研究,且聚焦于当时社会舆论的四个热点问题——抵御列强对华经济侵略问题、挽救农村经济破产问题、改革金融财政制度问题、选择国民经济建设之路问题,从而不仅将研究对象从个体人物拓展到多元群体,而且将个人经济思想、群体经济思想和社会经济思潮糅合在一起,有助于读者能够更为丰富、更为全面地了解这一时期的经济思想。

其次是将经济思想与经济实体运作状况和政治局势相结合,突破就思想论思想、就经济论经济的传统框架,含有社会经济史研究的特色。以往的经济思想史研究,基本上限定在经济思想的领域,既缺少与经济实体相融合,也缺少与政治局势相联系。但是,在实际上,经济思想与实体经济运作和政治局势变动都有着千丝万缕的关系,经济思想既是经济实体运作状况的反映和需求,也是政治局势变动的酵母和产物,顾及这两方面的关系,无疑可以显示经济思想史研究的新面貌。吴敏超在这方面做出了力所能及的努力,对三刊作者群体的经济思想进行了一定的实体经济状况印证;对他们的经济思想在政府政策层面和社会经济层面所产生的影响进行

了不同程度的考察，揭示了他们在应对白银危机、改革货币制度、开征所得税等政府重大经济政策制定中所发挥的理论参与作用；对每一份刊物和每一个群体背后的政治派系和主义进行了较为详细分析，探讨了经济学者与政府、政党、社会的关系。

把经济思想、经济实体和政治局势结合起来进行研究，可以说是社会经济史的研究方法。我在不久前完成的《中国近代社会经济史》的前言中，根据国内外学者关于社会经济史研究范畴的阐释，总结提炼了较可操作的社会经济史体系应该包含的五个层面，即思想观念层面、经济决策层面、政治和社会环境层面、经济活动承载层面、生产和管理技术层面。吴敏超的著作，涉及了前三个层面，具有社会经济史专题性研究，或从社会经济史角度研究经济思想史的色彩。

其三是将研究对象主体与关联的时人群体和后人研究相结合，跳出就事论事的思维定势，构建更为宽广的评判系统。思想史研究不仅是对一个人或一个派别的思想的罗列和陈述，而且要对其思想的时代价值和社会影响进行评判，这就既要考察和分析其言论本身的价值，还需要观察它与当时其他相关言论之关系。特别对于一些社会热门问题，除了会受到相关理论界主体的关注而发表言论外，还会受到其他各方面的关注，会有各方面的言论，后者与前者的异同和关系如何，对评判前者的价值和作用来说便是一种社会测量器。吴敏超的著作注意到了这一点，由于她所讨论的四大经济问题，是当时最为人们所关注的热门问题，除了上述三个刊物的作者群体有集中的言论发表之外，还有其他的刊物发表其他学者的言论。为此，书中还广泛运用《银行周报》、《社会经济月报》等经济刊物，以及《东方杂志》、《大公报》等综合性报刊的相关言论，作为参照，力求从宏观上把握经济学界的言论。这样的研究，既有利于反映整个经济学界乃至社会各界对这四大经济问题的思想状况，也有利于显示这三大刊物作者群体的思想特点。

此外，由于书中所讨论的四大经济问题，也是战后及新中国成立后国内外中国经济史研究者所研究的重要问题，提出了不少的“事后认识”。如果说，书中所研究的三大刊物作者群体对其亲身面临的四大经济问题的见解，是一种“即时认识”的话，那么它与后人研究中的“事后认识”有什么样的关联，也可以说是评判这些“即时认识”学术价值的另一个测量器。对此，吴敏超的著作亦有所涉及，特别是对于当时外资对华扩张程度和中国经济发展水平的考察方面，书中较多地以后人研究成果予以印证。这两类认识的异同，不仅可以印证这些“即时认识”的学术价值，

4 国难中的学术与政治:中国经济学界的争鸣(1932—1937)

揭示“即时认识”与“事后认识”的继承和发展关系,为这些问题的进一步研究提供有价值的参考;也可以体现经济思想史研究中的学术性因素和时代性因素。

吴敏超的著作虽然显示了一些研究角度的开拓创新之处,但是尚属尝试,还有待强化和深化。其中第二和第三方面的开拓创新,应该说是本书最有价值之处,但在具体的研究中还显得比较薄弱,有些关连性研究还有待进一步挖掘和展开。尽管本书存在这样那样的不足和缺陷,其上述三点的开拓和创新还是值得称道和重视的。

虞和平

2014年1月8日

目 录

第一章 导 言	(1)
第一节 学术旨趣与研究现状	(1)
一 学术旨趣	(1)
二 研究现状	(7)
第二节 三份刊物与三种“主义”	(10)
一 汪系背景的《中国经济》	(11)
二 自由主义学者主导的《经济学季刊》	(22)
三 夹缝求生的左翼阵地《中国经济情报》	(29)
四 “主义”的对立	(37)
第二章 经济发展道路之争	(42)
第一节 国难中的经济	(42)
一 基本走势	(42)
二 工农业萧条与贸易衰退	(46)
三 一线生机还是穷途末路	(53)
第二节 寻找发展道路	(58)
一 经济落后的根源	(58)
二 整体变革还是渐进改良	(61)
第三章 列强经济侵略之痛	(68)
第一节 共识与分歧:列强对华经济侵略	(68)
第二节 民族危机:日本对东北的经济侵略	(76)
一 侵略之经济动因	(76)
二 侵略之具体表现	(79)
第三节 “中日经济提携”与“开发华北”	(85)

2 国难中的学术与政治:中国经济学界的争鸣(1932—1937)

一	反对“中日经济提携”	(85)
二	警惕“开发华北”	(89)
第四节	“反帝”的号召力	(95)
第四章	发展农村经济的出路	(101)
第一节	农村破产	(101)
一	农村破产的表现	(101)
二	农村破产的原因	(108)
三	根本与“枝节”两个解决方案	(111)
第二节	金融枯竭与信用合作社	(115)
一	农村资金流向城市	(115)
二	质疑信用合作社和农业仓库	(118)
第三节	谷贱伤农	(129)
一	经济危机背景下的谷贱伤农	(129)
二	改进生产技术还是改变经济制度	(133)
第四节	焦点所在:土地问题	(138)
一	解决土地分配问题:共同愿望与不同途径	(138)
二	三面不讨好的土地“村公有”方案	(145)
三	减租与减赋	(149)
第五章	应对金融货币危机	(157)
第一节	改进银行制度	(157)
一	银行业的畸形繁荣	(158)
二	建立中央银行制度的图景	(163)
第二节	评述白银问题:从银贱到银贵	(167)
一	银价下落期:“无根之繁荣”	(167)
二	银价上涨期:深陷困境	(171)
第三节	讨论货币改革:从废两改元到法币改革	(181)
第六章	改造财政制度	(194)
第一节	不合理的财政收支系统	(194)
第二节	批评旧税整理	(203)
一	毁誉参半:关税改革	(203)
二	猛烈痛击:盐税和统税改革	(207)

第三节 热议新税开征	(212)
第七章 谋划经济建设	(221)
第一节 国民经济建设运动中的朝野努力与分歧	(221)
一 蒋介石倡导的国民经济建设运动	(222)
二 学者对国民经济建设运动的评价	(225)
三 和而不同:学者提出的国民经济建设方案	(228)
第二节 自由经济与统制经济的抉择	(235)
一 时代潮流:统制经济	(235)
二 质疑之声:中国能实行统制经济吗?	(242)
第三节 战时财政问题	(247)
一 未雨绸缪:战时财政的紧迫性	(247)
二 路在何方?	(248)
第八章 结 论	(256)
附录 1930—1937 年中国经济领域论文目录举要	(270)
参考文献	(312)
后记	(327)

图表目录

表 1—1	《中国经济》主要作者简介	(17)
表 1—2	《经济学季刊》主要作者简介	(25)
表 1—3	《中国经济情报》主要作者简介	(34)
表 2—1	1931—1936 年国内(包括东北)产品总值	(45)
表 2—2	1928—1936 年中国进出口贸易净值和物量指数	(50)
表 3—1	1931 年英、日、俄、美直接企业投资性质分类	(72)
表 4—1	1932—1936 年上海、河北农产品价格指数	(103)
表 4—2	1931—1936 年全国重要作物产量统计	(104)
表 4—3	1929—1937 年中国重要农副产品输出统计	(105)
表 4—4	1926—1937 年中国粮食进出口数量	(105)
表 4—5	1931—1934 年农产品购买力指数	(107)
图 4—1	1931—1934 年农产品购买力	(107)
表 4—6	1933 年各地农村借款和借粮债户百分率	(116)
表 4—7	1920—1934 年上海现金集中情形	(116)
表 4—8	1934 年各银行农贷数量及放款总额	(125)
表 4—9	1931—1934 年上海农产品趸售物价指数	(130)
表 4—10	1927—1933 年上海洋米进口数量及洋米、国米 价格比较	(131)
表 4—11	1912、1931—1936 年全国田赋占地价之百分率	(154)
表 5—1	1928—1936 年全国重要银行库存和存款变动	(159)
表 5—2	1926—1936 年中国汇率和银价变动	(168)
图 5—1	1926—1936 年中国汇率指数和银价指数	(168)
表 5—3	1932—1935 年中国银价、汇率、白银出口和 对外贸易	(175)
表 5—4	1930—1935 年上海物价指数	(175)

表 5—5	1933—1935 年上海白银库存情况	(176)
表 5—6	1934—1935 年中国白银出口量	(179)
表 5—7	1933—1935 年经济学界对货币改革方案的探讨	(185)
表 5—8	1935 年马寅初与赵兰坪等人的论战观点举要	(187)
表 6—1	1929—1937 年南京国民政府财政收支概况	(195)
表 7—1	1934—1937 年南京国民政府交通费和建设费支出 情况	(233)

第一章 导言

第一节 学术旨趣与研究现状

一 学术旨趣

中华民国 38 年历史中，政治跌宕起伏、内外战争不断。其中，南京国民政府统治下的 1927—1937 年，是相对统一、安定的时期。经济方面，政府较为努力地推行各种财经政策，较为积极开展工业、交通建设。但是，由于 1929—1933 年世界经济危机的影响，日本占据东北并向华北扩张的严峻形势，以及内乱频仍，经济建设的国际、国内环境并不理想。“九·一八”事变后，国人有感于日本侵略造成的民族危机，认识到建设工业化、现代化国家的任务已刻不容缓，而当时面临的诸多经济问题，如农村破产、白银危机、工商业萧条、财政赤字等，令人倍感焦虑。南京国民政府在内忧外患的条件下，是否扮演好了经济建设决策者与组织者的角色，十年间经济建设状况如何？应当说，对于南京国民政府时期的经济状况及取得的建设成果，学术界一直存在较大争议。

大陆学者总体认为，虽然国民政府较为努力地进行了一些经济建设的尝试，但由于外界诸多因素的干扰，1927—1937 年的经济发展并没有出现多少亮点。20 世纪 80 年代问世的研究以史全生的《中华民国经济史》为代表，认为 1927—1937 年是经济上半殖民地半封建程度逐步加深的时期。一方面，帝国主义对华加紧商品和资本输出、争夺中国的货币权，日本加强对东北的经济和政治侵略；另一方面，国家官僚资本主义增强了对国民经济的垄断，农村经济进一步破产。^① 许涤新、吴承

^① 史全生主编：《中华民国经济史》，江苏人民出版社 1989 年版，第 205—298 页。

2 国难中的学术与政治:中国经济学界的争鸣(1932—1937)

明主编的《中国资本主义发展史》第3卷,强调1932年至1935年中国出现的经济危机的负面作用,并认为这是除了外国发动的侵略战争外,中国经济遭遇的最严重的一次打击和考验。作者认为这次经济危机的原因是:1926年后工业品价格上升快于农产品,1931年后物价下跌,农产品价格的下跌又远快于工业品,农产品交换价格不利,导致农村白银大量流入都市,农村经济破产,国内购买力大大下降;“九·一八”事变和1931年长江大水灾加剧了经济危机。^①新近出版的《中国近代经济史(1927—1937)》(三卷本),认为这十年的经济发展情况大体可分为三个阶段,1927年至1931年,随着国民政府政权的建立,全国政治形势趋于稳定,经济有所发展;1932年至1935年,由于世界经济危机传导至中国,加上东北沦陷,工农业和金融业大受打击,多数行业在1934年陷入低谷;1935年底法币改革实行后至1937年,经济走出低谷,物价回升、工农业恢复发展。总体而言,这十年的经济状况经历了恢复发展、严重衰退、再恢复发展三阶段,呈现出双峰骆驼形的发展和变化态势。^②应当说,随着时间的推移和研究的深入,大陆学术界对1927—1937年经济状况的总体评价逐渐提高,并趋向客观和周详。

台湾大部分学者则认为,战前十年是经济建设的“黄金十年”,是为抗战胜利奠定物质基础的艰苦时代。侯家驹认为,1927—1937年是“艰苦建国的十年”,“中华民国在艰苦的环境下,却尽了最大的努力,致力经济发展”。对十年经济建设成果持积极肯定的态度。^③1989年出版的《中华民国建国史》中写道:“从北伐成功全国统一,到七七事变全面抗战开始,是中华民国自开国以来少有的一段建国良机,因此有人称之为黄金十年。不过也有人深感此一十年建国的努力受到太多客观的限制,行之不易,所以称之为艰苦建国的十年。”该书作者则认为“在并不十分有利的客观条件下,上述经济建设的成效并不完全符合预期目标,但大体上,情况相当令人满意”。^④“黄金十年”的提法、“情况相当令人满意”的感叹,代表了台湾学界对1927—1937年经济发展的肯

① 许涤新、吴承明主编:《中国资本主义发展史》(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5—7页。

② 刘克祥、吴太昌主编:《中国近代经济史(1927—1937)》(上、中、下三册),人民出版社2010年版。

③ 秦孝仪主编:《中华民国经济发展史》第一册,台北近代中国出版社1983年版,第470页。

④ 台湾“教育部”主编:《中华民国建国史》第三篇,《统一与建设》,台北“国立编译馆”1989年版,第1266—1267页。

定态度。不过,值得注意的是,他们也强调这十年受到较多客观不利条件的制约,并未达到“预期目标”。所谓不利的客观条件,主要是指日本全面侵华的威胁、国共内战等。

域外史学家亦是众说纷纭。《剑桥中华民国史》的有关章节即展现了杨格、小科布尔等人的不同观点。^① 1985年,台湾“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主办的“抗战前十年国家建设史研讨会”上,赵中孚评论马若孟提交的英文论文时这样总结道:“马教授介绍近来西方学者对建国十年的建设的看法,Young的看法较同情南京政府,Eastman和Coble则较激烈,马若孟则综合各家意见……马若孟教授对抗战前十年的国家建设虽予以肯定,但认为策略不好。”^② 这里的“Young”即为杨格,著有《1927至1937年中国财政经济情况》。他认为在这十年中,南京政府推动现代化的意愿和实现能力,较之往届政府有了很大提高。虽然传统经济部门如农业和手工业的进步有限,但现代工业、交通运输、金融业等都取得了较大增长。^③ Coble即为小科布尔,著有《上海资本家与国民政府(1927—1937)》。他认为南京国民政府统治下的前几年相对繁荣,但从1932年起,经济陷入衰退。主要原因是世界范围内白银价格的上升、1931年的长江水灾和日本在东北的侵略。1934年至1935年,中国经济萧条。江浙资本家的力量受到削弱,并且资本家越来越为政府所支配。小科布尔从同情资本家的角度出发,批评了政府在经济领域的为所欲为与独裁。^④ 最近出版的国外代表性研究成果,有日本学者城山智子的《大萧条时期的中国——市场、国家与世界经济(1929—1937)》。^⑤ 她认为在世界经济危机时代,国际银价的剧烈波动严重影响了中国经济的正常运行。1931年至1937年被其称为“萧条年代”,农村崩溃、工业萧条、金融恐慌。1935年11月法币改革实行后,中国经济从萧条局面中逐渐复苏。美国学者罗斯基则对战前十年的经济发展持

① [美] 费正清主编:《剑桥中华民国史》(下),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4年版,第167—188页。

② 台湾“中研院”近代史研究所编:《抗战前十年国家建设史研讨会论文集(1928—1937)》,1985年,第1000页。

③ [美] 杨格:《1927至1937年中国财政经济情况》,陈泽宪、陈霞飞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1年版,第436—448页。

④ [美] 小科布尔:《上海资本家与国民政府(1927—1937)》,杨希孟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8年版,第162页。

⑤ [日] 城山智子:《大萧条时期的中国——市场、国家与世界经济(1929—1937)》,孟凡礼、尚国敏译,江苏人民出版社2010年版。

十分乐观的态度，他著有《战前中国经济的增长》，认为中国在这一时期受到世界经济萧条的冲击并不严重，经济并没有大幅萎缩。^①

如此迥异的结论，不仅与学者的研究视角有关，也与他们所处的学术氛围、社会环境有关。尤其是大陆与台湾学者对南京国民政府时期经济状况的评价，显然与两岸政治形势的变迁密切相关。我们不禁要问，身处当年的人们是怎样看待这几年的经济状况的，尤其是经济界专业人士是如何评价的？在“九·一八”事变的国难阴影下，经济学者提出了哪些救亡主张？在20世纪30年代相对自由的舆论环境下，蓬勃发展的经济界期刊为这些疑问提供了参考。

本书试图以20世纪30年代丰富的经济界期刊为主，参考当时经济学者的诸多著作，来研究这个充满争议与危机的时代，以期构建20世纪30年代中国经济学者眼中的经济图景，并探讨他们的应对方案与政治诉求。由于这种研究针对的是历史事件刚刚发生时所激荡的即时性反应，将为全面观察当时的经济史和思想史提供一个崭新的视角。美国现代货币主义大师、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米尔顿·弗里德曼在相关研究中，曾特别注重引用当时在国民政府中工作的官员或者专家——例如张嘉璈、杨格等人的观察。他的看法是，直接经历当时中国经济的同时代人的记述，比后来人依据零散、不准确的数据加工编制的系列统计数字可能更为可靠。弗里德曼的这一研究方法给人以诸多启示。事实上，考察当时经济学者的言论，不仅仅在于了解他们到底说了什么，而是透过他们的主张观点，让我们有机会触摸到那个时代的整体思想氛围、社会变迁与政治分野。

从1927年至1937年的经济状况来看，以1931年“九·一八”事变的发生为界，可分为前后两段。1927年至1931年，随着南京国民政府的建立，政治形势逐渐趋于稳定，经济有所发展。1931年夏，长江流域发生大水灾。“九·一八”事变后，中国失去了东北这一中国外贸唯一顺差的地区，关内的民族工业丧失了东北市场，加上“一·二八”事变对上海的破坏，时人感叹天灾人祸接踵而来。当时最负盛名的经济学刊物《经济学季刊》，在1932年底推出“国难专刊”，专门讨论国难时期的金融、经济问题，表达了强烈的民族危机感。1932年是世界经济从经济恐慌中逐步走出的一年，却是中国经济走向低谷的一年。到

① [美] 托马斯·罗斯基：《战前中国经济的增长》，唐巧天等译，浙江大学出版社2009年版，第177—183页。